

谈往录 戊戌

陆建德 著

北京
京出

历史叙述多裂隙，所幸的是我们或许能够在隙缝中窥见一些建构“史实”的动机。

戊戌談往錄

陆建德
著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谈往录 / 陆建德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200-14338-6

I. ①戊… II. ①陆… III. ①辛亥革命—通俗读物
IV. ①K25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7890号

总策划: 安东 高立志
特邀编辑: 韩慧强
责任编辑: 高立志 向 雳
责任印制: 陈冬梅
装帧设计: 吉 辰

戊戌谈往录

WUXU TANWANG LU

陆建德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87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338-6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收在本集的文章，写作跨度较长，有的是十多年之前的旧作，如《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乱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是上个月才写毕的。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讲到中国商人或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回扣。近来经常读到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美文，个别作者往往设定，中国人使用中文，天然具备其他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能力和崇高情操。我以为我们必须进入历史细节才能对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行为特色有所认识，鲁迅绝不过时，不可不读。本书中三篇文章（外加两条附录）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值得再说几句。保路运动是武昌军变的先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关研究却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来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几个抽象概念，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并主导铁路建设、外资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办川路公司的财务，等等）反而被边缘化了。我试图从新的角度评述这场运动的性质，抉发保路宣传背后的地方官绅利益和普通民众的损失。我在1978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之前，做过几年街道企业的出纳，祖父又是浙江大学会计，对川路公司的账簿产生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运动离不开三大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汇纂》），在此特向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这些史料的四川

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1916—2013年）致敬。^①在海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伍宗华先生在《汇纂》的序言中给保路运动定性。他写道：“令人感触至深的，是《汇纂》辑录无可辩驳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保路运动以及为之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揭示了这一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开创功能，并以铁血铸成的文字颂扬了千百万誓死捍卫路权的群众，在推翻满清政权的伟业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可以说，该书无异是献给辛亥革命先驱们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厚礼！”^②这篇序言的语调和措辞，可以暂时不论，它写于1991年11月，当时编者已经在数年前将史料全数捐献给来大陆开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委托该所编辑出版。当时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未能认识《汇纂》的价值，实在是一大憾事。《汇纂》也收有戴执礼先生本人撰写的序言，观点与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时的标准表述，盛宣怀是“卖国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汉路的重庆秀山人李稷勋则是盛宣怀的“走狗”。果真如此吗？

建造川汉路，确需非凡的勇气。当年投身这一事业的人士中，我最佩服的是盛宣怀手下的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今年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前的“戊戌变法”又成为媒体的热门

① 1959年，《汇纂》中部分史料曾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四川铁路运动史料》。

②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全三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年，上册“伍序”第1页。

话题。猛进者“破天一声挥大斧”（谭嗣同诗），而李稷勋这位戊戌年的殿试传胪是踏踏实实为国效力的。与李稷勋一度共事的还有詹天佑，后者亲自踏勘设计川汉路宜昌至归州一段，并出任总工程师兼会办。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汉路内部的贪腐和结局？晚清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在新的学制下一些学工程的回国留学生获“工科进士”称号，詹天佑是其中之一。川籍的李稷勋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世的，那一年爆发“五四运动”。2019年，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纪念上述两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学生的爱国之举？《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一文想回到当年更复杂的现场，一个处于大国博弈和国内矛盾背景下的现场。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隐隐觉得激进学生暴力行为所反映的习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的发荣。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在上海会出现不利于北京中国政府的谣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大声起木铎》一书中一再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关注外部势力的干预。

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文铮教授为本书须签，在此谨表谢忱。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新京报》的好书评选活动，在庆贺仪式上还为《游隼》一书的出版社、译者颁奖。为了应景，我自称喜爱观鸟，手机里存有七八种鸟类的照片。想不到这段短短的致辞见报时，七八种变成了“七八十种”，也许是我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引起误会。同事朋友中不少人订阅《新京报》，他们会不会真以为我摇身变为颇有成绩的爱鸟人？其实我只是在去年秋冬之交才对住处附近的鸟类有所

关注，用手机拍下蓝天里飞翔的鸽群和树上栖息的斑鸠、喜鹊、灰喜鹊、乌鸫、极北柳莺和白头翁，有一次甚至拍到一只正在啄食过冬柿子的灰喜鹊。近一两个月，我看着小小的灰喜鹊一点点长大，无所顾忌地游戏，俨然是小区的主人。它们没有婉转的歌喉，叽叽呱呱地叫着，偶尔甚至会从窗外的玉兰树枝上好奇地打量着我，也许是把当成乏味的房客了。这些被英国诗人济慈称作“轻盈的长着羽翼的精灵”^①天天陪伴着我，就把这本小书献给园子里时而热情、时而静谧的仙子吧。

陆建德

2018年9月1日

^① 济慈《夜莺颂》里的原文是“light 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Dryad”系希腊神话中的树精。

目 录

- 1 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
——关于腐败的想象
- 18 从日本看中国
——吴汝纶东游小记
- 29 蜀道难
——保路运动百年回顾
- 附录一：“人民”与“会匪”
- 附录二：赵尔丰宣布四川自治文
- 81 致乱的金苹果
——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
- 106 烈士之死
——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
- 117 分与合：辛亥研究新范式
- 163 陈独秀的德国大炮

174 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

——读《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187 校长之忧

——兼听“五四”杂音

214 残瓣与百花

——杨绛先生菲尔丁论文的两个版本

242 王梵志、胡适与郑振铎

254 逃难

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

——关于腐败的想象^①

近年来，齐如山（1875—1962年）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杰出贡献已渐为大陆读者所知。他的回忆录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台湾问世的。1989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了该书的大陆版，印数少，删节多（主要集中于第十三章《谈家常、离开北平》）。200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花生文库的《齐如山回忆录》远胜于宝文堂的版本，所删部分补回不少。但是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交代，“正文基本未作删改”，书中还是残留了一些缺乏自信的省略号，它们都该由这“基本”两字来解释了。

不像中国旧时文人，齐如山的著作都不是引证经史讲大道理的。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社会中实在情形”尤多究心，这种求知的方式可以说是“不由恒蹊”了。齐如山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本文只是撮要介绍回忆录中个别有关回扣和社会腐败的事例，同时结合广为流传的瓦德西和赛金花的故事，来看百年间世道人心的变与不变。

先从齐如山在京师同文馆的经历说起。同文馆是为培

^① 本文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南方周末》。

养翻译而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最初只招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几年后增设科学馆，招收满汉学员，年龄大大放宽。齐如山十九岁时由翁同龢“交办”入馆，在馆学习约五年，时间当在甲午与庚子（1894—1900年）之间。义和团进京后，除了杀洋人，还要杀与洋字沾边的二毛子、三毛子，同文馆师生只能星散。^①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而也可以说是北大前身了。

齐如山进馆前，就对这家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非常熟悉。齐家是河北高阳人，他哥哥竺山已经由高阳同乡李鸿藻保荐到同文馆就读，馆里各种情形都是家中谈资。洋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只负责教务，并不能引起艳羨。四位中国提调官管理馆内各种不动产，这才是令人眼红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结婚，很多人还是有科名、着官服的文官，他们精明世故，立即注意到提调官是肥缺：同文馆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回扣。或者说，他们对非分的好处，有一种非凡的嗅觉。不过，厨房里负责采办的厨子于八得钱最多，这哪里骗得了他们的鼻子。

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是一顿一两银子，定得极高。学生吃饭一桌六人，每桌饭菜合六两银子。学生自己算了笔账：照市价，六两银子的酒席可以上大盘大盘的燕窝鱼翅，而同文馆的餐桌上只是有些鱼肉罢了，一桌开销恐怕

^① 据佐原笃介、沅隐编辑的《拳乱纪事》记载，义和团曾发揭帖威胁：“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转引自沈弘《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一文，载2001年11月21日《中华读书报》。

不到二两银子；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等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二百两银子，合四个大元宝。^①这笔款子中一小部分大概是孝敬提调官的，其余都被于八鲸吞。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厨子，已经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钱肯定是从学生伙食津贴里克扣下来的。这个于八，平时在同文馆还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面对那些恶狠狠地要他侍候的“先生”（厨子对学生的称呼）不敢穿官服，戴官帽。齐如山写道：“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读到这里，读者也不免感叹。首先，在一个盛行回扣的国度，忠诚的观念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社会上下失序，势所必然。索取回扣者名义上所服务的机构，不论姓公姓私，实际上已沦为他肆无忌惮地盘剥的对象。其次，当权者卖官鬻爵带来一种滑稽而又荒唐的社会等级开放性，厨子摇身一变，成为候补道台。整个国家由此必患严重骨质疏松症，稍受外力冲击，骨头就开裂脆断，如此孱弱，骨架再大又有何用。其实，中国捐纳的弊政一直可以追溯到秦代，汉代的典籍中就多买官的记载，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制度，只好以官位求金钱，以解燃眉之急。

回忆录中还有一些与厨子于八相类的人物，他们的共

^① 据2006年9月25日《新京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北京中小学“营养餐”供餐企业要给学校各种形式的回扣，致使“营养餐”并不营养。

2018年11月7日补注：从今日《新京报》获悉，山东多地的工厂专售超标高达300倍的劣质油，很多油罐车司机参与作弊。各个行业的“厨子于八”还有待媒体一一曝光。

同特点是地位不高收入高。一种是部院衙门里的杂役，统称经承。（经承中有一类叫火房，不知于八算不算。）他们见到级别最低的官员也必须站立，但是他们经办具体事务，握有实权，人人要往他们手里送钱行贿（如系采办人员，索要的就是回扣）。例如经承中的书办熟谙《大清律》，善于立名目，找条例，不论办什么事，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一支笔，各级官员只有在他们起草拟定的文稿上书押署名的份儿，于是很多所谓的领导沦为专权的下属的傀儡。中国社会腐败难除，吏权侵夺官权是原因之一。梁启超在他早期的《变法通议》里就写道：“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①

另一个横财不断的行当是炉房。各省交解户部的帑银运到北京后，先要交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地方解运官必须补足。于是炉房时常借成色低来敲诈，补交的银子则由炉房与银库的工作人员分肥。大家眼睁睁看着政府税源流失，无所作为。中国当时没有国家银行，也没有统一的国库，一直到1906年才设立官商合办的银行。在无数票号、钱庄和私营银行的包围下，财力单薄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维护不了国家最基本的利益。清廷就像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大象，无数像于八和炉房那样的鬻蚊尽情吸食它的鲜血，轰然倒地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先生们”的行为又如何呢？他们一进馆每月就有膏火银三两，这是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

^① 参看侯方域文章《额吏胥》，收入《壮悔堂遗稿》。

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再加三两。齐如山入馆两三年后每月有十二两银子的进账，那时翰林做家教，月工资也只有八两银子。同文馆学生待遇从优，纪律却十分松弛。不少学生在馆里挂个名，一个月去取一次膏火银，虚掷光阴，难怪入馆也要夤缘奔走（齐家兄弟就是例子），学业则无人认真查问。^①据说有一位学生俄文学了十三年，总算把字母表记住了。真正在馆里长进大的，反而是那些向学生学习中文的洋教习。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对膏火银的态度有了转变，意识到发给学生的廩膳银两“不但无以坚向学之诚，反足启喻利之渐，非所以重士也”。^②

齐如山对他昔日的馆友，似无好感。他们中不少人自由散漫，多市井习气。有人擅自把餐桌上的白糖、鸡蛋带回家，厨房不得不多加提防（例如把糖直接撒在炸糕上），学生见状就使泼耍赖，手法多端无耻，几难置信。有的常逛窑子，半夜回到馆里就叫开饭，这又给厨房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馆方决定建饭厅集中就餐，竟然有学生以自由的名义强行抵制，即使后来勉强去了，还继续使出各种花招与厨房方面恶斗。比如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听

① 同文馆大堂上挂有取自《晋书·陶侃传》的对联：“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见丁魁良著《花甲记忆》，沈弘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74页。丁魁良作为总教习其实有点疏忽职守，他没有把主要精力与时间投入同文馆。

②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第一章第十七节。转引自《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学生中家境真正困难的，校方还是会酌情核给津贴。明初兴学，官办的府、州、县学的生员吃饭是免费的：“师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明史·选举志一》）

任炭火烧着，也不加水，硬是把火锅锅底烧化。一天晚上火锅烧化了三十几只。需要添饭，就远远地把空碗往厨子身上扔去，接不着就砸在地上，餐后一地都是破碎的瓷片。他们越是不顾脸面地吵闹，厨房经营成本越高，越吃不到垂涎已久的燕窝鱼翅。厨子心里怎么会对这些“先生”存一丝一毫的尊重呢？种种关于厨房贪渎的猜想并不全是疑心生暗鬼，然而最使读者感慨的是学生的行为体现不出是非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现在不会据理力争，将来更不会犯颜直谏，满肚子只有破坏性发泄的能量，一举一动依然是主我自私，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所憎恶的于八们同出一源。整个社会吃回扣已成惯例，学生的怨气仿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么多的好处，居然被你于八拿去了，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来吃亏！如果利益一致，他们和于八立即成为共谋。难以想象的是学生中绝大多数已经是科名的文官。

日本的洋学馆成立于1855年，比同文馆早七年。当时日本一些倒幕勤王的志士（如吉田松阴）为学“兰学”（西学）几乎不惜性命。为什么洋学馆与同文馆有如此的差别？我们至今还难以回答。

二

让我们把话题从厨子于八和一地碎瓷片的精神转到一位德国军需官。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北京城内也处处设坛，同文馆停办，齐如山暂避河北老家。他于阴历六

月下旬回到北京，发现很多建筑已被烧毁，^①“整个北京，已经不成世界”。联军进京（阳历8月14日）前后的几天，城内大乱，齐如山的记述很让人难堪，他说多数劫掠是中国人所为，主要抢的是当铺和粮米店。后来秩序恢复，齐如山请原同文馆德国教习柏罗恩（时任东交民巷守卫军司令）开具一张通行证，从此在城里行动无碍。此时的北京如何得以治理，从回忆录中可以得到粗略的印象。其实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的极好切入点。^②齐如山懂一点德文，与德国军人交往较多。当时一位负责采购的德军“粮台总办”正在求购木柴。齐如山为之牵线，很快办妥，价钱、运费都由中方的掌柜韩某说了算。韩某在战时还赚到钱，十分感激，就把这

① 最可惜的就是翰林院以及院中珍藏的《四库》底本和残存的《永乐大典》于6月23日（阳历）被暴徒焚毁。纵火者来自攻打使馆区的义和团及其支持者。翰林院在英国驻华使馆北面，火起时正刮北风，很快火舌就危及使馆建筑，馆内“无数男女老幼之人”惊慌救火。详见普南特·威尔著《庚子使馆被困记》，冷汰、陈诒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② 《齐如山回忆录》第70页有这些文字：“全中国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创始自日本人，日本人办警察，第一日第一堂上课就有我，我不可以做纪念吗？”1898年7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仿照西方各国警察制度和上海租界巡捕成例”，在长沙创设官绅合办的保卫局，这大概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起源。可惜保卫局三个月后夭折。德国人规划建设青岛的情况见余凯思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中山在1912年10月访问青岛时曾说：“中国尽管有数千年文化，但没有创造出可与德国在短短十二年间所做出的业绩。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巨大的勤奋和努力精神。”见该书第327页至第328页。天津社科院在2004年出版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倪瑞英等译）中也有天津城市交通、治安和公共卫生如何从无到有的经过。

位德军翻译介绍给北京商界各种人物。齐如山自己乘机开了“义兴局”，生意还做得十分顺当。德军有各种货物（大概包括抢来的“战利品”）等候处理，也需要购入各种货物，从砖瓦木料到绸缎布匹，无所不有。“义兴局”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齐如山做买办，好像不大光彩。其实对此难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如果当时的北京人都拒绝与联军有任何商业往来，联军势必会强行征用军用物资，中国百姓将因此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德军采办官员梅星先生的见解。这位“粮台总办”还从一个当时普通中国人料想不到的方面给齐如山上了一课。

梅星先生在齐如山帮助下购得木柴，就给他一笔利钱。齐如山出于中国式的习惯，要给梅星先生回扣，不料对方回绝得非常干脆，还借机把从小与于八们周旋的齐如山带到一个陌生的价值世界。他说：“你用不着谢我，你不要以为我是和你通同作弊呀……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梅星先生是不是揩公家的油，卖方当然最清楚。与这个德军粮台交往一多，齐如山大有感触：

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

德军侵华的一切费用最终都会算在索赔的清单里，但是我们也不必因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残酷性而无视梅星先生的存